



河南省戏曲工作室编

河南曲艺丛书  
乔清秀坠子唱腔集

乔清秀 乔利元唱  
章沛霖 记 谱



河南省戏曲工作室编

一九八二年元月

11074

## 目 录

乔清秀小传	张凌怡	( 1 )
乔清秀年谱	张凌怡	( 12 )
试论乔清秀的坠子唱腔艺术	王致安	( 15 )
乔清秀、乔利元唱段		
凤仪亭		( 42 )
三堂会审		( 52 )
关王庙		( 62 )
昭君出塞		( 71 )
韩湘子渡林英		( 81 )
王二姐摔镜架		( 93 )
兰桥会		( 103 )
因果报		( 113 )
半建游宫		( 122 )
河北寻兄		( 133 )
小寡妇上坟		( 142 )
双锁山		( 153 )
宝钗扑蝶		( 164 )
独占花魁		( 175 )
改良拴娃娃		( 185 )
马前泼水		( 196 )
吕蒙正赶斋		( 206 )
洛阳桥		( 216 )
白猿偷桃		( 229 )
李存孝夺箭		( 239 )
编者的话		( 250 )

# 乔清秀小传

张凌怡

## 入 门 学 艺

1924年冬，从大名县通往邢台的路上，车夫推着一辆独轮车吱扭扭地迎着凛冽的寒风向前滚动。车上，一边放着简易的行装和杂物；一边坐着一个十五岁的女孩子。脚、腿都用紫花带格的棉被裹着，上身，内穿棉袄，外罩兰底白花的棉布褂子。团团的脸，透着聪慧，忽灵灵的眼，显得精明。一根发辫搭在脑后，一条兰头巾紧扣双耳。右手虽被冻红，还在轻轻地击打着檀木简板，嘴唇已经冻木，亦然在低低的哼唱着……。她忘却了冰天雪地，忘却了刺骨的寒风，一心要在车上学会三个唱段到邢台演出。走着哼着，哼着走着，这天来到了邢台，当晚便在小河子外边段老治的茶社里上演。姑娘拍打拍打身子，净了净脸，掂起简板上场了。先唱一段《小天台》（即《韩湘子渡林英》），她那甜润的嗓音，清新的腔调，欢快的情感，一下把听众们征服了。一段唱罢，不答应，再唱一段，还是不答应，车上学的三段都唱完了，听众还要叫她唱，因为还从未听过这样的河南坠子。无法，师父只好出来道歉：“姑娘刚入门儿，就学会了三段生意都唱完了，实在对不起……。”“叫她再重唱一遍！”听客们几乎是众口一词喊道。姑娘就这样一出头便唱响了邢台。她就是刚入曲艺行伍一年的、后来成为乔派坠子创始人的著名坠子演员乔清秀。

提起清秀的身世令人酸楚。她本姓袁，名金秀，清宣统二年（1910年）七月四日出生于河南内黄县的店集村。父，袁相巽，人送绰号“白瓶儿”（言其脸白）；母，袁张氏，河南南乐县元集

村人。由于当时帝国主义侵略日甚一日，清王朝的腐败愈来愈重，于是，一度曾被禁止的鸦片烟毒又在泛滥，不仅城市中有吸食者，即便农村也有染此恶疾的。金秀父——袁相巽就因吸食鸦片，致使他们全家凄苦不堪。

那是1915年秋，袁金秀刚刚六岁，其妹双玉三岁之时，袁相巽为了弄到一笔钱财吸毒，竟暗地里将她娘儿仨一块卖给了人贩子。幸亏金秀娘闻信儿早，拉金秀抱双玉，急匆匆躲到了迁居河北大名县南关的娘家。不久，袁相巽找来，金秀的姥姥便对他说：“你也不用将她娘儿仨卖给人贩子，我给你三串钱，权当卖给我了！”袁相巽接钱回家继续吸毒，不久便死在村头的小庙里。这年，金秀娘又生了三女秀娇，一时生活更加困苦。为了活命，金秀的二姨抱走了双玉，金秀娘带着出生不久的秀娇改了嫁，金秀一个留在姥姥的身边。袁相巽一家，就这样死的死，散的散，剩下她们娘儿四个还分到了三处。

金秀自幼体弱多病，长到七、八岁还是瘦脊背的，走路还要扶着墙。偏遇上姥姥是个怪脾气暴性子人，略不顺心不是打就是骂，这使缺少父母疼爱的金秀更感到人世间的寒冷。但她并没有终日以泪洗面，而是缄口寡言，尽力干活。后来，在不影响给姥姥干活的情况下，到附近一家学堂里念书，由于她心灵性慧又肯用功，所以，常常受到老师们的赞扬。学堂里教唱歌，金秀学得极认真，尤其爱唱欢乐的歌，唱起这样的歌来，她常唱得既动情又动听，好象要把人间的寒冷在她那欢乐的歌声中融化掉似的。金秀的童年是这样缺少欢乐，所以她便极为憧憬和祈求欢乐，这大概便是后来在她那嗓子声腔中极力追求欢快情绪的一点由来吧？！

金秀年长十四岁，即1923年，一日街上来了个年轻的说书人。只生的明眉大眼，诚恳精干，唱起书来，不仅有声有色，而且腔调与众不同。金秀的姥姥一见就动了心，想叫金秀学说书，又怕金秀不愿意，想先试探试探，谁知金秀一口答应。于是，金

秀的姥娘就对这个说书的说：“俺听你说的书不错，叫俺外孙女跟你学说书好不好？”这个说书的看金秀个儿虽然不高，身子又瘦弱，但模样好又怪聪明，就说：“试试噪吧。”不试犹可，一试，金秀的嗓子又甜又亮。这个说书的当即便满口答应：“行啊，这个徒弟我收啦。”从此，金秀拜师入了说书行，取艺名为乔清秀，随师走四方。这个说书的不是别人，他便是后来和乔清秀一同创制乔派坠子唱腔的乔利元。

乔利元，清光绪二十四年（1898年）九月二十六日生，家住河南南乐县乔崇町村，比清秀年长十二岁，小名春秋，自幼家贫，在同村一户姓杨家干“掌鞭”。这东家不仅会唱两口山东大鼓（即梨花大鼓），还会弹弦子。利元常跟他哼唱，越哼越想哼，于是，在他十七、八岁时便到大名县龙王庙投师程长会，正式唱起梨花大鼓来。不久，河南坠子传入豫北，利元便也改习坠子，可他的坠子腔中，却带着浓郁的山东梨花大鼓味儿。

起初，清秀随利元习唱，利元对清秀讲：“你学我只能学个根本，打个基础，要唱好，必得你创出一条新路来。常言说，‘老师领进门儿，修行靠个人儿’嘛！”聪明人不用多讲，一点即破。自此，清秀在利元唱腔的基础上，耳濡目染，善于吸取，精心创造，终于根据她自身的条件，哼出了一个新腔。利元热情地给她以鼓励和支持，在去邢台的路上，便要她用新腔唱会三个小段。谁料，在邢台清秀来了个“出头红”，这对清秀和利元都是个极大的鼓舞。由于利元和清秀在曲艺事业上的共同追求与生活上的相互照顾，因而，使他们在情感上便越来越接近。1926年秋，清秀的姥娘突然要清秀脱离乔利元回大名县，清秀向利元坚定地表示：宁愿随他唱一辈子书，也不愿再回到姥娘的身边。这样，利元便带清秀回到自个儿的家乡南乐县，一面与清秀的姥娘协商，一面让清秀与其母亲、三姨商议。她娘她三姨都愿意，她姥娘也就无可奈何了。从此，利元和清秀由师徒而成为夫妻。这时，利元已经又收了一个男艺徒王清顺，他们便重整行囊，由南

乐县出发，奔丘县，去临清（县），到东昌（府），进济南等地演出。清秀由唱小段儿而开始跟利元学唱中、长篇书《刘同勋私访》、《段包卿投亲》、《白绫扇》等。清秀记性特别好，一日能背书八百句，开始她和利元唱对口，没过多久，她便一人撂单了。在临清演出时，利元从河南濮阳县请来了琴师康元林。康在给别人伴奏时，可能被说成是“二茬子”弦手，但自他和清秀合作之后，二人是互为增补，相得益彰。他们的唱伴不仅是水乳交融，而是浑然一体了。康元林的伴奏，无论是走过门、托唱腔，或是助声情、造气势，都成了乔派坠子艺术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。据济南王云峰老师（曾为著名坠子演员郭文秋伴奏）回忆：清秀去张家口演出时，恰值康有事不能随行，临时换了弦手，结果，清秀“栽”到了张家口，一月合同两天便完。回津后，清秀说：“今后除康元林之外，谁的弦也不用”，由此可见康元林对乔派坠子之贡献。清秀有了新腔，有了书，还有了配合默契的琴师，就较前大进一步，唱到哪里，哪里挽留，走到哪里，哪里欢迎，但她仍不满足，1928年又从清河县请来了梨花名家潘春聚，并拜他为师，学了他的《二打天门》、《五虎平南传》等部书，决心更上一层楼，向更高的艺术境界攀登。

## 天津十年

1929年，正是绿柳萌发、桃蕾绽放的初春，一条从保定驰往天津的木船上，乘坐着清秀、利元一家。由于天津玉茗春茶楼的邀请，也为使清秀见到更大世面和得到更大锻炼，他们决意闯荡天津这个曲坛圣地。此时，清秀已是廿岁的人了，红扑扑的脸面比当年丰腴了一些，一条辫子也比当年粗了长了。虽然在保定出发前已给她做成了两身好衣裳——提花缎面的女皮袍，可她现时仍穿着一身青布的棉袄棉裤，怀抱着刚满三岁、聪明伶俐的女儿——小巧坐在船头，一边逗着、亲着爱女，一边和利元、琴师康元林说着话，从她那明亮的一双眼神里，可以看出她那激动、

兴奋的心情。

在玉茗春茶楼一开始便日夜演出两场，共唱六段；日场上演《二打天门》，夜场演出《五虎平南》。艺人行里都知道：“大书要劲儿，小段要味儿”。而清秀的中长篇是二者兼而有之，所以便吸引了听唱和听书的两部分听众。茶楼生意日盛一日，听书观众愈上愈多，不过，清秀逐渐发觉听众更喜爱小段子，于是，在开正书之前便有意地加唱一个或两个小段儿。一日夜场，清秀开场唱的是《三堂会审》，谁知一曲未了，掌声雷动，场子何止“开花”，而是“炸场”。没多久，离玉茗春不远的东来顺茶楼，唱梨花的“莲子香”便受到了很大的冲击，乔清秀由此也在天津曲坛榜上挂了名。

如果说，清秀在未进天津之前，她的乔派坠子已有了良好的基础，那么，从1929至1933年在玉茗春的四年中，则是清秀对其进行充实、规整、提高和升华的重要阶段。为使乔派坠子推向一个更高的境地，从曲目到唱腔、表演，甚至开唱前的“敲套子”、音乐伴奏等，清秀和利元、琴师康元林、老师潘春聚都在逐一进行改进，尤其清秀达到了废寝忘食的程度。清秀的语音由于生长在大名县而接近北方，为突出其腔调的俏丽和脆劲儿，她便有意地吸收了大鼓里的京口，但又不忽视中州的尖团音。利元唱呼延庆时，往往把庆字唱成“钦”字音，清秀就不答应。在唱腔上，过去艺人中有“书尽缘法满，唱口无尽期”的说法。意思是：再好的书终有唱完的时候，书尽人散；而一个演员的腔调（即唱口）如能被人所喜爱，这个“缘法”就无尽期了。清秀觉得，能有一个被听众们喜爱的基本腔调当然很好，不过就此“死定”下来，不再变化发展了，不也变成了老一套了吗？为此，她和琴师康元林商定，在对唱腔和伴奏规整时，既要叫人家听着是自己的调，又要使他们百听不厌。因而，在学习借鉴时，就要更注意吸收溶化，更注意化为己有。当时，在天津唱梨花的名将“盖山东”鹿巧玲曾教给清秀一段唱，今日教，第二天清秀便

“化”进她的腔调中唱出了，唱得又巧又俏，还得了“好儿”，鹿巧玲感慨地说：“哎呀，小秀这一手可真利害呀！”清秀学习借鉴了不少人的东西，可她要不讲，谁也不知道。如《宝钗扑蝶》的首句“三月春光锦一般哪，桃花开遍大观园”的唱腔，便从《河南坠子艺人刘金喜（李治邦的爱人）那里吸取变化而来。还有经常和利元搭班同穴（即艺人合伙演出的组织）演出的卢教端、卢永爱父女和大老黑任永太，他们那欢快的节奏与巧口俏调，也曾被清秀所借鉴吸收。甚至看电影她也在考虑着如何丰富她的唱腔，有一次看电影听了周旋唱的《孟姜女哭长城》，她觉得曲子不错，没过多久，便在她唱的《梁山伯与祝英台》的唱腔中出现了。乔派坠子以梨花（大鼓）为骨，坠子为肉，河南字工北路口等众多特点而形成，确实是独树一帜，有很大的创新。这固然与清秀的善于吸收、善于溶化和她那聪明才智、异常的音乐天赋有关，但更重要的是她在艺术上严肃认真，一丝不苟，永不满足和孜孜不倦进行创新的可贵精神。由于清秀勤奋刻苦的努力，不仅使她那欢快活泼、俏丽俊巧、清脆圆润的乔派坠子艺术特色更为鲜明和感人，同时还得到天津曲坛名家刘宝全、金万昌、荣顾臣、小蘑菇们的大加赞赏，昆仑唱片公司还为清秀灌制了《小寡妇上坟》、《独占花魁》、《改良拴娃娃》三张唱片，为首荐乔清秀、传播乔派坠子起了“先锋”作用，清秀在玉茗春发了迹。1938年10月6日的天津《庸报》在“歌场回顾续录”一文中便有记载，说：“……七、八年前（即1930年后——笔者），聆听乔（清秀）之河南坠子于玉茗春（乔之发祥地）所歌者为《三堂会审》，洒脱宛润，抑扬吐吞……”“可谓‘中州大鼓享佳名，不只神清貌亦清’”。就在这样的情况下，清秀对自己的艺术仍然要求极为严格和认真。她天天演出天天都不满足，总不断找出些不足之处。如果一个唱段，或是一腔一字，一个鼓点，一个过门，一抬手一投足，原设计的在某处要出效果，而演出时没出来，下场后，不吃不喝不休息，她也要和琴师一起找原因，然后

则对着穿衣镜重新排练，直到再上场演出有了效果方肯罢休。从1934年起，清秀才离开玉茗春移至北海楼东升茶社上演，本来清秀的身子就不大好，这时就更虚弱了，不少人回忆她这一段演出时的情景说：演出前，她常在后台一张小床上躺着养神，看上去是少气无力、病恹恹的。可一旦化了妆、上了台，则判若两人，精、气、神都来了。只见她，身穿白色大褂（有时穿青的、灰的），上绣展翅欲飞的红凤凰，脚穿丝光袜子黑色高跟皮鞋，头上梳一条大辫儿，出台几步，对观众弯身一躬，辫子由身后而搭至胸前，然后一甩辫子一昂头，二目灼灼，鼓箭一亮，生气勃勃，气度非凡，未曾开唱，便赢得一个满堂好。难怪大家都说她是台下一条虫，上台一条龙了。清秀为使乔派坠子得以臻完美，不仅劳累成疾，她唯一的爱女小巧身得急病，也因演出延误医治而夭亡。在津十年中，她只到北宁公园玩过一次，还是利元特意动员她去的。

功夫不负有心人，乔清秀实现了她来津之夙愿，不仅在津站住了脚，还得到了“坠子皇后”、“坠子大王”的美誉。1934、1935和1937年，驻上海的美国亚尔西爱胜利唱片公司继昆仑唱片公司之后，邀请清秀和利元灌制了《洛阳桥》、《兰桥会》、《吕蒙正赶斋》等十七张双面唱片。1937年这一次，先是南京来津邀请去演出，后被京韵大王刘宝全邀至上海大中华饭店演出之间灌制的。唱片很快发行全国，乔派坠子也随之传遍大江南北，仿效者愈来愈伙，影响也愈来愈烈。坠子唱腔原本只有东路、西路两种基本腔调，自此，乔派坠子便以它那独特鲜明的艺术风格与东路调、西路调鼎足而三，成为坠子的北路调。不仅有专攻乔派坠子的演员，即是原来唱东路、西路坠子的演员，也在自己的唱腔中以嵌进一段乔派坠子招来听众。乔派坠子不只是极大地丰富了坠子的唱腔艺术，还大大地提高和扩大了坠子的声誉及影响，不少人认识河南坠子便是从乔派坠子而开始的。乔派坠子是河南坠子的一个艺术高峰，这不仅为大家所公认，而且，时至今日也

还没有人逾越它。

清秀和利元到天津后，收了一媳（未过门）两个养女，她们是乔月楼、乔喜楼和乔凤楼。在清秀的安排和辅导下，她们在艺术上都有专足的进步，月楼、喜楼唱的坠子是地道乔派，尤其喜楼，很快便有了“小清秀”之称，凤楼的京韵宗师于刘（宝全）派，唱的也很好。当清秀身子欠佳不能演出时，她们小姊妹便挑起了养家糊口的重担。清秀在北海楼东升茶社只演出了两年有余，后来便在大观楼、小梨园、庆云、天宫等处作间断性演出。在此期间，曾与著名京韵大鼓演员小采牛（骆玉笙）同台演出，后应邀赴济南，归来后，身子便越来越坏，终朝只能靠白水泡馒头度日。症状肚鼓，实谓肝病，虽经医延治，其效甚微，利元据别人介绍，奉天有名医善治此病，为给清秀治病计，决意携带全家前往。

### 奉天之行

一列奔向奉天的火车上，在二等车厢的中部临窗坐着一个三十岁的女人，穿一身素净皮袍，罩着黑呢外套，一头剪发，满脸病色，少气无力地观看着车窗外白雪皑皑的冰冷世界。这是1939年初，乔清秀为医治疾病在赴奉天（即沈阳）的途中。未离津前，利元曾托人到奉天联系，恰值公余茶社老板刘雯珍邀角，一为清秀治病，二为糊口养家，于是，乔氏全家还有琴师康元林、老师潘春聚、师兄索利福和任永太等一齐应邀前往。当时的奉天，已归属日本帝国主义豢养下的伪满州国，对待中国人民，尤其下层的人们更为卑视。火车每到关口时，便驱赶车上乘客下车检查，对那些衣着褴褛的穷苦百姓和卖艺为生的艺人，往往被作为“共党嫌疑”而让他们跪着接受检查，甚至挨打。因一、二等车厢可以除外，所以，利元特意让清秀独乘二等车厢。一行人到奉天后被安顿在交通旅馆，由于清秀不能演出，利元只有带着月楼、喜楼和凤楼、任永太等，到南市场“四海升平”茶社演出，

利元安置好这一边，才着手为清秀请医治病。当时，奉天有位绰号叫“一善人”的安善义，确能治此病，利元登门拜求，甚得安先生同情，于是，便用心与清秀调治。安先生除用穴位疗法外，还以饮服煮茶叶为辅助，经半载医治，清秀的病情大好。饭也能吃了，茶也敢喝了，身子逐渐恢复，精神逐日增加。为感谢安先生，清秀拜为干爹。与此同时，乔文波（小名河清，利元原配所生之大儿）送他的姥姥（即清秀之母）来到奉天，多年未见的母女更是悲喜交集。精心的调治和母亲的会见，使清秀大为宽解，至年终竟与完人无二了。清秀母过罢年就要回老家，为给母亲筹集一笔丰盛的归资，也为答谢治愈疾病的安先生和奉天的同人，以及公余茶社的盛情相邀，清秀决意于1940年的新春里，在公余茶社演出。

海报贴出，坠子喜爱者奔走相告。大约是正月初五开始上演，当时相声演员顾海泉和张庆森正在公余演出，于是，连同其他形式，如奉天大鼓等，一同与清秀配合上演。演出情况，如同《老残游记》第二回中记述王小玉演出的情景相似，未曾开书，便座无虚席了。演出的第二天，突接伪满奉天宪兵队请柬，要清秀和其女前去陪酒，清秀不予理睬；二场演过的翌日，又请，仍不理。大伙都为清秀和利元捏着一把汗，其实这类事对清秀和利元已不是头一遭了。

清秀、利元不是摆架子瞧不起人的艺人，即使清秀出名之后，凡来投他们的，无不盛情相待。尤其利元更是一付热肠，喜欢广结友谊，对待难中朋友都是管吃管穿，赠银送两，象李治帮、刘金喜夫妇就是利元邀至天津的。但是，他们顽强的坚持着“认认真真卖艺，清清白白做人”和“卖艺不卖身”的准则，从不服，从不让步，特别是清秀，生来无媚骨，更对卑视艺人的人深恶痛绝。还是1927年清秀十八岁在东昌府演出时，某军阀部队的一个团长叫堂会，要清秀点烟倒茶，清秀理直气壮地说：“俺这是庄稼玩艺儿，既不会递烟也不会倒茶，只会说书。让唱就唱，不叫唱俺就走”，就这样离开了这个团长的家。又一次，

某一军阀队伍里的连长到茶棚里听书，他嗑一个瓜子就把瓜子壳向清秀的头上投去，一个，清秀忍啦，二个三个，让啦，到第四个，清秀冲他便骂，这家伙想闹事，被后台的演职员和前场的听众给镇住了。在济南进德会和松菊公园演出，恰值军阀韩复榘给他父作寿叫堂会，清秀一条辫子分成俩，穿黑挂皂，俩头发梢上都扎着白头绳，被韩训斥一顿，不叫清秀唱，其实正合清秀心意。类似这等事举不胜举，当然，有时也为此事花钱生气，甚至挨打挨骂，但清秀从未低过头。她在艺术上精益求精，演出上严肃认真，为人是清白耿直，这些直到如今还为不少曲艺界的前辈们所津津乐道。清秀对奉天的情况知之甚少，及至后来才知道这里的“官”方对艺人更为卑视，对女艺人视为妓女一样，叫吃饭就得去吃饭，叫陪酒就得去陪酒，不然，想方设法使你就范。清秀原想病治好了，演出几场酬谢酬谢大家，把母亲送走就赶快离开此地，谁知刚演出两场便接二连三地送来了“请柬”，还没等清秀和利元商议出一个对策，当第三场演罢，利元陪清秀离开茶社刚到旅馆不久，宪兵队便突然包围旅馆进行所谓的搜查，并以“八路的探子”之嫌疑罪，把乔氏夫妇和随利元一块去奉天的管某押进了宪兵队。家人惊慌，朋友们奔走，多方营救，三日后放出了清秀和管某，原说不几日就放回利元，突一日，宪兵队又到旅馆谎说利元已逃走，反口向清秀要人，就这样，利元在非法关押期间被残害致死，有说坐电椅，有说被狼狗吞噬，活不见人死不见尸。清秀精神失常，四出寻访，见人就问：“乔先生在您这儿没有……，”众人只有暗自流泪而无法以实相告，待清秀意识到利元确实不在人世时，已到了1941年，清秀娘已回老家，这年九月，清秀全家准备返回，谁料，宪兵队又四处堵截，不准他们出走，在不少同行的帮助下，全家化装走出奉天两三站，才登车返回天津。

1942年在北京出刊的《三六九》画报第234号韩某的一篇报导中写道：“……乔清秀则仍健在，并于客岁初冬抵津，下榻于

天津天晴茶楼后台。伊于小梨园旧合同未满，约在旧历年即在小梨园登台……”，所谓“小梨园旧合同未满”者，系指清秀赴奉天时曾借支小梨园五百现大洋之事，为偿还旧债，清秀于1942年初便在小梨园演出了十余场。又在南市的庆云戏院、新中央剧院、天祥四楼，大观园等处演出。还应邀到北京三庆大戏院、西单吉祥剧院和白凤楼开设的茗园茶社演出。从京返津不久，便旧病复发，卧床不起了。自利元死后，清秀无一日不在思念中，为使乔家后继有人，从奉天回津，她作主便给乔文波、乔月楼二人办了婚事。病倒之后，医药无效，茶饭不思，终朝在病榻上听着利元的唱片度日。有时听见她低低地呼唤着亲人的名字，有时又断续地有气无力地喊叫着要报仇、要伸冤……。1943年农历正月十三的这一天，阴云密布，冷风阵阵，乔派坠子的创始人，河南坠子杰出的艺术家乔清秀，在天津四合轩胡同六号院内的一所房间里，在播放着利元和她合唱的欢快、活泼的乔派坠子声中，含恨含冤悲愤地与世长辞了，时年三十四岁！

乔清秀用毕生精力和心血浇灌培育的乔派坠子之花，犹如清秀的为人一样，品格高尚，清雅俊丽，深受广大劳动人民的喜爱，直到如今还广为传唱。十年动乱时，某些城镇和农村的干群们，竟冒着极大的风险在深夜里播放乔派坠子唱片，以解他们思念之渴。乔派坠子不仅在黑暗的旧社会给广大群众以欢悦，而且还可以它那明快的格调鼓舞着人民去追求美好的未来，它不只是河南坠子史上的一个里程碑，也应是我们民间艺术的一份宝贵遗产，因此，我们有责任去搜集它，整理它，学习它，继承它，使它发扬光大，创造和培育出更多更好的曲艺之花。1982年正是乔清秀逝世三十九周年，撰此小传，以为纪念！

另，在搜集、访问乔氏夫妇史料中，曾得到乔氏夫妇的亲属和友好们的热情帮助，在此一并致谢。

1981年12月于郑州

## 乔清秀年谱

- 1910年(清·宣统二年)7月4日，生于河南内黄县店集村。父，袁相贤，绰号：白瓶儿(言其脸白)；母，袁张氏，河南南乐县元集村人。自幼取名袁金秀昵称小秀。
- 1915年，六岁，二妹双玉三岁，随母到河北大名县姥姥家居住。不久，三妹秀娇出生。
- 1916年，父因吸毒死于店集村。二娘领走双玉，母带秀娇改嫁，金秀一人留在姥姥身边。
- 1917年，金秀在姥姥家边干活边上学。
- 1923年，十四岁，拜河南南乐县乔崇町村乔利元为师，习唱河南坠子，起艺名乔清秀。乔利元(1898—1940)先习梨花，后改坠子，是清秀启蒙师，后与清秀结为夫妇，对清秀的成长有重大贡献。
- 1925年，至邢台演出，三个唱段使清秀崭露头角。利元在南乐县收男艺徒王清顺，先习唱，后学拉。
- 1926年，清秀与利元结为夫妇。到丘县、临清、馆陶、东昌、济南等地演出。向利元学唱《刘同勋私访》、《段包卿投亲》、《白绫扇》等中长篇书。
- 1927年，生一女孩，聪明伶俐，起名小巧。利元从河南濮阳县请来琴师康元林(1899—1967?)，后成为清秀艺术上的主要合作者，对乔派坠子有重大贡献。
- 1928年，拜清河县梨花大鼓名将潘春聚为师，学唱《二打天门》、《五虎平南》、《呼延庆征西》等部书。赴安阳、石家庄、保定等地演出。

- 1929年，二十岁。从保定乘船应邀到天津玉茗春茶楼演出。  
入冬，爱女小巧夭亡，輟演三日。利元的男艺徒王清顺出师离津。
- 1931年，清秀、利元未过门的儿媳乔月楼（原名付爱子）到津，随清秀习唱，利元母亡故，他独自回家奔丧。
- 1933年，利元母三周年祭，清秀随利元回南乐县，同去者还有卢教端。
- 从1929—1933年，清秀在玉茗春度迹，也曾到歌舞楼赶场，与京韵大王刘宝全同台演出，并收女艺徒董清风。崑崙唱片公司灌制了清秀的《独占花魁》、《小寡妇上坟》、《改良拴娃娃》三张唱片。
- 1934年，移至北海楼东升茶社演出，并在该茶社后楼居住。十二月，美国亚尔西爱胜利唱片公司灌制利元的《洛阳桥》唱片。乔凤楼（原名刘秀英）到津，清秀收为养女，习唱京韵。
- 1935年，六月，清秀和利元应胜利唱片公司之约，赴沪灌制了《兰桥会》、《因果报》、《昭君出塞》、《河北寻兄》、《宝钗扑蝶》、《重建游宫》、《关王庙》、《吕蒙正赶斋》、《马前泼水》、《白猿偷桃》、《李存孝夺箭》等十一张唱片。回程在南京等地演出。带回了乔喜楼，清秀也收为养女，习唱坠子，不久，便有“小清秀”之称。曾到谦德庄小住，后搬进和平区紫阳里居住。
- 1937年，应南京鸣凤茶社邀请前往演出，后被刘宝全接往上海大中华饭店跳舞厅演出。年底，胜利唱片公司又灌制了《凤仪亭》、《王二姐摔镜架》、《韩湘子渡林英》、《三堂会审》、《双锁山》五张唱片，后经南京、济南等地返津。住延安剧场二十四号路。
- 1938年，在津小梨园与著名京韵大王演员小采午（名骆玉笙）同台演出，下半年病重，辍演。
- 1939年，赴奉天（即沈阳）治病。清秀母至沈，母女相会。

1940年，在沈公余茶社上演，因受日本帝国主义迫害，清秀、利元俱遭非法逮捕，利元致死，清秀虽然释放，神志失常。

1941年，清秀母返家，清秀全家返津。住小马路候家后四和轩胡同六号。

1942年，为偿还旧债，在小梨园演出。应邀赴京演出。乔月楼与利元大儿乔文波结婚。

1943年，旧病复发，医药无效，死于天津四和轩胡同六号，享年三十四岁。

〔张凌怡〕